

蒋介石为反攻大陆组“白团”

借日反共促生“白团”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白皮书》,清算了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预言共产党将获胜。闻此消息后,蒋悲愤难抑,他决定启用之前就已秘密部署的一枚棋子。8月9日,他立刻安排国民党驻日代表团第一处处长曹士澄执行秘密任务,拟定“借日反共”计划。

9月10日,曹士澄在东京高轮区密会富田直亮、冈村宁次及其他11名日本陆军军官,签订盟约书。

同遭到美国抛弃的蒋介石一样,这些日本军人也是被抛弃的群体。战后,日本政府禁止战犯、前军人和参与战争的其他人担任公职。而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反战情绪,一些私人企业也不愿雇用他们。很多人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结盟组织成立后,富田直亮成为这个项目的团长。为了掩盖日本人身份,每个团员都起了中文名字,富田直亮以后就叫白鸿亮了——因为他的“中文姓”,同时也为了昭示与红色共产党对抗之意,这个组织取名为“白团”。

日本陆军少将富田直亮和白团曾是台湾等级最高的军事机密之一。他们辅佐蒋介石二十年,核心工作是谋划“反攻大陆”。2016年10月,日本作家野岛刚的《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在大陆出版,又将这些日本军人的秘密工作呈现在公众面前。



蒋介石与白团部分成员合影

蒋介石的“小目标”

对于日本人,蒋介石原本有个大目标:在台湾组建十万人的“义勇军”,将台湾青年军与日本军人以9:1比例混编,排长以上的技术人员和领导人员均由日本军官担任,成为歼灭解放军的骨干。但这个计划很快破灭,征招如此众多日本兵并不现实。

白团只能先开始蒋介石的那个“小目标”:注重于教育训练及建立制度。蒋本人常去白团听课,尤其是富田直亮的课。当时白团协助蒋介石培训军官的形式极为多样,有专门训练师团长、兵团参谋长以上高级军官的“长期高级班”,也有训练兵团参谋、连队长级军官的“短期中级班”。具体接受白团培训的军官

数量目前无法考证,但据曹士澄回忆,光是从1952年8月到1959年3月底,“白团”配合台湾“国防部”在石牌成立动员干部训练班,就培训了两万多人。

夭折的“光计划”

1952年9月,在蒋介石的要求下,“白团”开始研究这一计划,代号“光计划”。但是,白团并未采取蒋介石一直希望的以浙江、福建为“反攻”目标的战略,而是以珠三角为假想目标发动登陆战。这主要是考虑到在当时,物产更丰富的广东比福建更有战备补给价值。这份计划一直到1953年6月左右才最终完成。蒋介石相当满意,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其方针与余原意相同,今后准备工作应积极指导。”

1953年,美国换了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对台政策发生根本逆转。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国都没有正面回应蒋介石的出兵计划。而在日本,冈村宁次也开始受到驻日盟军司令部的压力。

蒋介石不得不再再缩减白团规模。1969年2月,白团在东京宣告解散。

据《看天下》

林则徐晚年赞同生产鸦片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

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罌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李鸿章官高权重,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罌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罌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据《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

遍查正史野史,在军师或谋士这一类人物中,诸葛亮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与之相比,知道赵普这个名字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但事实上,刘备的蜀汉政权只能算是一股地方割据势力,从头到尾,满打满算也不过存在了五十年,其中由诸葛亮主持

工作的二十年虽然治理的不错,充其量也只是勉强做到了偏安一隅,最终还是在三国中第一个灭亡。而赵普辅助自己的君主建立了一个历时三个多世纪的大王朝,他对大宋之功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

赵普为大宋王朝立下如此卓越的功勋,却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形象,这似乎很不公平。但凡事一定有其原因,此人的个人品质实在难以恭维。

赵匡胤曾经为了赵普而发明过一个不太常用的成语:“鼎

铛有耳”。有个叫雷德骧的御史中丞,劾奏赵普强占市人第宅,聚敛财贿。皇帝大怒,斥责道:“只要是像鼎和铛这样有耳朵的东西就听说过,赵普是我器重的人!”命令左右拖着这位大臣在

名相赵普为何难流芳百世

庭前绕了好几圈,帽子都掉到了地上,还警告他不许对外人说起赵普的事。

史载,有一次宋太祖登门去看望生病的赵普,看到廊下堆有刚送来的十瓶礼物,就问是什么东西。赵普说是吴越王钱俶送的海货。皇帝好奇,打开一看,却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皇帝当时心情很好,告诉赵普受之无妨,并笑言:钱俶大概认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决定吧。话虽如此,这件事却一定会在皇帝心里产生阴影。后来,皇帝又发现了赵普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等

很多问题。这些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行为,终于使赵普逐渐失去了皇帝的宠信。

当初受太祖袒护时,赵普有恃无恐,连太祖的弟弟赵光义都不放在眼里,两个人矛盾很深。

太祖死后,赵光义继位成为了太宗皇帝,赵普被贬出京城。由于太祖的死太过突然,而“兄终弟及”并不合宗法,此事遂成宋初又一桩千古疑案,当时朝野中的舆论就对太宗颇有不利。于是赵普主动向太宗示好,密陈说自己手里存有杜太后留下的遗书,早已约定了太祖死后传位于太宗,即所谓“金匮盟书”。从各方面分析,赵普提供的应该是伪证无疑,而他这一举动对赵光义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从此他又得宠于太宗皇帝,在朝中东山再起。不过,以这样的品行,纵然成就了千秋功业,也很难流芳百世。

据《中国经营报》

《永乐大典》正本已陪葬嘉靖皇帝?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是永乐皇帝直接主导编纂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它成书于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十八年明朝迁都北京后,其原稿仍存放在南京文渊阁,在明代中期毁于大火,正本则迁藏至北京皇宫中的文楼。

大典修成一百多年后,到了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世宗十分喜爱《永乐大典》,案头常置数册供随时翻阅。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皇官奉天门、三大殿和午门发生火灾,嘉靖皇帝命人抢运《永乐大典》。由于抢救及时,《永乐大典》逃过此劫。经此一事,嘉靖帝考虑到这部千辛万苦编纂的巨著,仅此一部,万一遭到不幸根本无法补救。因此,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他下令让徐阶、高拱、张居正监督抄书生109人重抄一部,严格按照永乐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按规定誊抄3页,每册录毕,于册后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等衔名,以示职责。全部重录工作直到六年后的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这就是副本。在副本即将抄写成的前一年,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

十分蹊跷的是,在重录副本工作完成之后,正本不知从何时起不知去向了。

中华书局的张枕石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栾贵明先生却提出了这样一种有趣的说法,认为《永乐大典》正本

已作为嘉靖皇帝的随葬品葬入永陵地宫。

栾贵明仔细研究了《明实录》发现,《永乐大典》重录完成与嘉靖帝的丧葬大体是同时。嘉靖帝于1566年12月驾崩,1567年3月葬入永陵。也就是说,嘉靖帝死亡距下葬,有三个月时间。为何嘉靖帝死后3个月才入葬永陵?大胆的推断便是:在这段时间里,隆庆帝忙着把《永乐大典》正本放进永陵,以了却嘉靖帝的心愿,一直到嘉靖帝入土为安后,隆庆帝才有时间处理《永乐大典》的副本。“甚至重录工作或许都没有完成,而谎称完成,从而造成了副本的先天缺少,也并非不可能。”

据《北京日报》

释疑

“太子洗马”是给太子洗马的吗?

“太子洗马”当然不是指太子给别人送马,也不是替太子洗马,而是中国古代设置的一个官职名。

据《国语》记载:“勾践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洗马这个官职了。吴越争霸前期,越国战败,国君勾践被俘。为了将来报仇,他忍辱负重,甘为吴王夫差做臣子奴仆,其中就包括充当夫差的马夫,任由驱使。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录了“太子洗马”这个官职。“太子太傅,少傅的属官有洗马之官。”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洗马原十六人,秩比谒者”。又引如淳注:“前驱也。”可见在汉朝“太子洗马”是太子太傅或少傅的下属,一共十六人,职在“前驱”。

隋唐时期在司经局置洗马,一变而为掌管书籍的官。可见“洗马”有替太子做辅助工作的含义,引申为书籍官,以后历朝历代均设“洗马”。清代司经局所设洗马用满汉各一人,为从五品官。可见,“太子洗马”最初是为太子服务的专业人员,后来词义发生变化,洗马之职成了掌管书籍的官。

据《中华活页文选》

唐朝真的“以胖为美”?



步辇图

唐朝人真的和现代人的审美差别这么大,以胖为美吗?其实不是的,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画中的官女、仕女,根本说不上肥胖。

《步辇图》中的九个宫女,簇拥着李世民缓缓而行,有抬辇子的,有打伞盖的,有举扇子的。看起来都有一把子力气,绝非弱不禁风的病态美女。但是,看她们的身材,实在都是相当纤瘦的。《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大约是身份较为高贵,年龄稍大一些的缘故,身形略显丰满,但站立姿态无不婷婷袅袅,轻盈如春风拂柳。毫无疑问,她们的身材,完全可以用“苗条”一词来形容。

《次柳氏旧闻》、《唐语林》等文献记载,唐明皇的儿子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被李林甫构陷,处境危险,愁得他须发皆白,远离一切声色娱乐,日子过得十分凄惶。唐明皇得知后,让高力士派京兆尹,“选人间女子细长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可见,玄宗时代选美标准,也跟今天一样:身形苗条,身材高挑,皮肤白皙。

诗僧贯休的两句诗,也可以证明唐人不以肥胖为美:为人无贵贱,莫学鸡狗肥(《白雪歌》)。意思就是,人无论贵贱,都不应该养成肥胖的样子。换言之,唐朝人的荣耻观念中,有“以苗条细瘦为荣,以肥胖硕大为耻”一条。可见,唐朝人不但以肥胖为美,简直是极端憎恨肥胖的。

据搜狐网